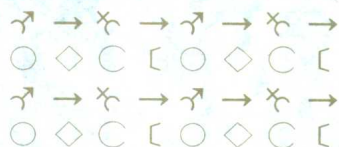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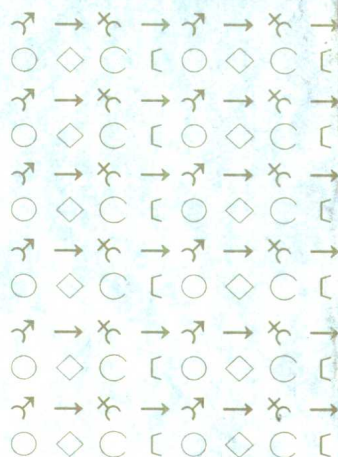


○ 新世纪经济论坛



刘永佶 著

民主中国

法制经济

中国
经济矛盾
四论



中国经济出版社

● 新世纪经济论坛
——中国经济矛盾论系列四书

民主中国 法制经济

刘永佶 著

本系列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中国·法制经济/刘永佶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2.1

ISBN 7-5017-5374-1

I. 民... II. 刘... III. 社会主义经济—经济理论
—研究—中国 IV. F1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1579 号

责任编辑:韩天雨

李晓岚

☎:010-68308640

封面设计:谭雄军

中国经济矛盾论系列四书

民主中国 法制经济

刘永佶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邮编: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11.75印张 280千字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7-5374-1/F·4322

定价:22.50元

关于“中国经济矛盾论系列四书”的总体设计

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系统论证，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内容。这是我 20 余年研究的概括，也是进一步探讨的目标。本系列的四本书，就是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系统论证。

创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提出的一个主体思路。当关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基本完成，我从方法论和经济学说史的探讨中认识到：中国经济是个矛盾主体，不能简单地套用产自西方或苏联的经济理论解决中国的经济矛盾。20 世纪经济生活中的诸多问题，都与这种“套用”有关。中国人应当、也有能力以自己理性的系统研究来揭示中国的经济矛盾。这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外国某一学派体系的派生物，而是以系统的理性思维对现实的经济矛盾现象概括所形成的范畴为主体，根据研究者与读者统一的思维逻辑从抽象到具体地规定和展开概念，由此来论证中国的经济矛盾。

20 世纪 90 年代末及 21 世纪初，也有一些人开始探讨“中国经济学的体系”，但其路数依然是以外国某一些学派的体系为本，视中国经济学为某学派的“派出所”；不去系统研究中国的经济矛盾，而是将中国经济现象作为例证，证明其所宗外国经济学说的正确，并试图以此来为“发展中国经济”提供对策。

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研究中国经济矛盾，不是排斥外国的经济学说，而应从外国政治经济学的演化中概括其一般性规律，掌握其主义与方法中的基本，并根据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系统研究充实它、修正它、发展它，进而确定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和主体范畴。外国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应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例证，而不是相反。

本系列四书的第一本“主义 方法 主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基本”，就是对近代以来世界经济矛盾与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总体概括，确定社会主义为研究的主义和支点，形成自己的方法论，明确研究的主题。主义、方法、主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该书系统论证了作者在这三个基本环节上的研究成果，其观点均为创造性的，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与原则、系统抽象法、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经济地位等，概括了作者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观点。

第二本“民主中国 法制经济”，是对中国经济矛盾和经济发展、改革的总体探讨，也是第一本书的展开。全书贯穿经济与政治统一，民主制是公有制的政治形式，社会主义法制是公有制经济的内在机制这一基本思路，论证了中国经济矛盾的历史根据，探讨了现代中国经济矛盾的四个方面及两种趋势，对体制改革、国有企业、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国际交往等几个大的问题发表了看法，最后以“以社会主义精神凝聚中国心”作结。

第三本“民权国有——国有企业改革大思路”，是对第二本书中有关国有企业部分的全面展开，也是对这个关乎现代中国经济矛盾与发展的核心问题的集中论证。此书已设想十余年（1989年曾提出了计划，观点和思路均已成熟，材料也基本收集够。其前提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的新规定，以及由此具体化的公有制与民主制内在统一。对国有企业的主要矛盾——所有权与占有权关系的规定，由此展开国

有企业权利体系中各层矛盾的分析，进而论证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则——以民主法制保证劳动者所有权，制约行使占有权的机构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并强化执法、司法机构的监督权。该书将系统阐述国有企业的占有权应由人民代表大会专设委员会行使，政府只行使管理权这一新思路。

第四本“中国经济矛盾论”，是本系列的概括，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论证。这里力求规定核心概念和若干主体概念，按从抽象到具体的概念运动，构筑体系，展开论证。该书不仅是本系列的总结，也是作者几十年研究成果的总结，因此，将集中时间和精力，努力做到概念明确、论证严谨。其关键和难点，就是对概括中国经济主要矛盾的核心概念，及它的展开——对各矛盾层次进行概括的主体概念的规定与论证。

从作者的愿望说，本系列四书将能确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由此为以后的研究确定前提。现思路明确，以两、三年时间，集中为之，争取成就。

刘永洁

1 引 言

以中医中药治中国病
择西法西方祛西域疾

9 一、官制的中国,官住的经济

——中国经济矛盾的历史根源

9 集权官僚制:中国历史的先进与特殊

16 官文化和小农意识

21 重农抑商——基本国策

26 抑制自由,阻滞发展

31 二、空想的自由资本与实际的官僚资本

——“中国为什么不能发展资本主义”解析

32 在中国,自由资本主义为什么是空想?

36 官僚资本:集权官僚统治在工业文明下的继续

40 政权资本化,资本官僚化

48 买办性的“开放”与殖民地意识

55 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

60 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61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则

66 “民众的大联合”: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必然性
与艰巨性

72 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局限

76 改革:社会主义制度摆脱其初级阶段的局限
向高一阶段的转变

82 四、坚持社会主义势力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

——现代中国经济矛盾辩证

- 83 社会主义势力之兴起与构成
87 以权谋私的腐败导致官僚资本死灰复燃
95 小农经济衰而未败
100 自由资本委曲发展
105 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势力与官僚资本势力的斗争
110 官僚资本势力占上风的危险性
117 由社会主义势力主导的改革发展

123 五、劳动者经济主体地位的实现与素质技能的提高

-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根本
124 与资本主义国家片面竞比经济增长
——“苏联模式”大误区
128 劳动者是经济主体,不是“生产要素”或“资源”
134 劳动力所有权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140 公有制:劳动力所有权及其派生的对共同占有的
生产资料个人所有权的制度化
146 20世纪初级公有制的主要缺陷:排斥劳动力个人所有权
150 确立和强化劳动力所有权及其派生的权利,提高
劳动者素质技能
156 从总体上协调劳动者地位和素质技能的提高

161 六、社会主义民主法制

- 公有制的法权保证和政治机制
162 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误读
167 民主制:公有制的法权保证和政治形式
172 社会主义法制:民主制的具体化与公有制的内在机制
177 “以法治国”,不是“以法治民”
181 驳“民主条件不成熟”论

187 七、体制转化之正道

——民主法制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187 所要改革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统制经济体制，
而非“计划经济”体制
- 19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阶段性体制，
绝非“社会主义 + 市场经济”
- 197 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明确规定并保证劳动者的权利
- 202 明确界定国家机构权能，克制和消除官僚资本
- 206 以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和完善市场经济秩序

211 八、药在民主治“国”

——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之根本

- 211 国有企业之病在“国”不在“有”
- 217 确立所有权主体的民主权利，加强对国家机构的控制
- 221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设立国有企业与资源占有
发展委员会
- 227 强化占有权对经营权的约束机制，确保经营权的运用
- 232 国有企业职工的权利与义务
- 236 强化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权和管理权
- 241 保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主体
地位和主导作用
- 246 “产权理论”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的局限与可借鉴处

251 九、小农经济改造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主要任务

- 252 农民：“历史包袱”，还是发展动力
- 256 什么毁坏了农村合作经济？
- 262 合作经济仍是必要选择：明确权利，加强法制
- 268 有效发挥自由资本改造小农经济的作用
- 272 强化农村教育，改革户籍制度

278 十、调整经济结构,完善运行机制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278 内生为主,外向为辅

283 首要结构是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教科优先

289 与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相适应的投资结构

294 调整产业结构:举国家之力组建主导行业

299 产业结构与流通、分配、消费结构的有机联系

304 扩大地方经济自主权

309 竞争机制,机制竞争

315 十一、自力图强,主动参与国际经济交往

——中国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中自主发展

316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是什么,有什么,干什么

319 由垄断资本财团发起的向全世界扩展其统治的运动

326 独立自主,还是成为依附于“中心”国家的“外围”?

331 主动积极:对外经济交往服从国内经济发展

337 竞争与保护:对外经济交往的双重策略

342 以民主法制规范和保证对外经济交往

346 十二、最大的力:以社会主义精神凝聚中国心

——中国经济发展动力论

347 经济是人的经济,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351 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是经济发展之本

355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凝聚现代中国心

360 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联合中国人

365 跋

以中医中药治中国病 择西法西方祛西域疾

这副对联是我在 1993 年出版的《中国经济矛盾导论》^①扉页上所题。8 年过去，我依然坚持它所概括的意思。“中医中药”并非古代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而是由现代中国人根据对世界发展规律和大趋势的认识，针对“中国病”——现代中国经济矛盾的诊断和医治，因此，也就是要形成现代的中国经济学说。在这个过程中，对“西法西方”要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同时，又应避免西方国家在其发展中的“疾”。

以中国为主体，以中国人为主体，由中国人根据中国经济矛盾规定理论，以中国的经济理论指导解决中国的经济矛盾。这是我从事经济研究二十余年得到的基本认识，也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所自觉的义务。

中国人知道政治经济学，并从政治经济学来思考自己的经济问题，是从 20 世纪初开始的，其标志为严复 1901 年译出斯密的《原富》，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现通行的简称是“国富论”（此意不当，我意若简可称“财富论”）。几乎西方国家所提出的全部经济学说，都被介绍于中国，并不同程度地被采用，其中，概述“斯大

^① 该书 1993 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林模式”或“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和美国“新古典综合派”的由萨缪尔森写的教科书影响最大。20世纪后半叶的前30年基本以前者的框架为主导,后20年又以后者占主流。

20世纪中国的演变,与外国传入的经济学说有密切关系,不论成败,都可以从对相应的外国经济学说的理解和应用中找到部分答案。这样说,并不是想把中国的成功或失败都归结于外国学说,我们更注重的是中国人对外国经济学说的态度及其理解、应用的能力,以及为什么不同的中国人会钟情于不同的外国经济学说。

总的说来,虽然20世纪的中国人中也出了几位自我感觉良好的“经济学家”,但是,他们及他们的抬举者基本上是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外国经济学的,并把所信奉和初步领会的外国经济学说视为一般性“绝对真理”,以为只要照办,就可以使中国的明天变成某外国的今天或昨天。

20世纪的中国经济,成了外国经济学说的实验场。这虽然有助于中国的变化,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经济矛盾,同时也使外国经济学说本身的缺陷及其产出地的经济问题,感染给中国。

外国的经济学说是其本国经济矛盾的产物,不论哪一家哪一派,都有其国度性和阶级性,而非纯粹的世界性一般学说。但它们的特殊性中又不同程度地体现着世界性一般。我们之所以要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就是要掌握世界经济一般性规律。经济的发展具有一般性,不等于在经济发展中走在前面国家的经济学说就是一般性学说,经济发展较慢的国家就应当按这些学说所概括的“一般规律”亦步亦趋。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学说又确实有可吸收、借鉴处,这不仅有其观点和思想,也有其方法。我们应从这众多的相互矛盾、斗争着的经济学说中,概括其一般性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把某一种学说视为绝对真理。

众多的特殊经济学中有一般思想和方法,但这并不就是

世界一般性经济矛盾和规律的全部表述，而只是对其认识的一个阶段或一部分。中国人也应当，而且能够从对本国特殊经济矛盾的认识中，概括对世界一般性经济矛盾和规律的规定——已有的外国经济学说起码因其没有对中国经济矛盾的规定而不能成为世界性的一般学说。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不能把自己的研究仅视为对外国经济学说的补充——运用外国人的观点和方法规定中国的特殊经济矛盾。在经济发展上的落后并不等于在经济学研究观点和方法上的落后。经济学研究者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是相当大的，他们完全能够以先进的方法形成先进的学说。在经济学的逻辑上，并不是以研究对象的发展程度，而是以对对象的研究程度来衡量其科学性的。

中国的经济学目的在于对本国经济矛盾的认识，这当然包括对世界一般性经济矛盾的规定（在这一点上需要对外国经济学说的概括），形成解决中国经济矛盾的思路，为现实的经济变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中国的经济矛盾就是我所说的“中国病”，而中国人对中国经济矛盾的揭示论证和提出的解决思路，就是“中医中药”。以中医中药调节中国这个机体，调动其自身的积极、健康因素，抑制消极、腐败因素，形成正常的生长机理，在治病的同时，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

中国经济矛盾的特殊性中包含着一般性，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中，也包含着一般性。正是在一般性的层次上，体现着与外国经济和经济学的普遍联系，因而也就有了吸收、借鉴外国经济学的必要性。

从一般的层次上吸收、借鉴外国经济学，是有分析、有批判、有选择的，要从其特殊中概括出一般性因素，不是以外国经济学的特殊直接论证或解决中国的特殊矛盾，而是从经济学一般性的层面充实和丰富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

认识中国特殊经济矛盾提供必要的借鉴。这就是“择西法西方”。至于外国经济学中的错误,或不适宜中国的内容,则应经分析予以明确,不能吸收就不吸收。在这个过程中,也要认真总结外国在其经济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尽可能地在解决中国问题时,避免它们曾犯过的错误,这就是“祛西域疾”——而非由我们去解决外国的经济矛盾。至于外国人会从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吸收、借鉴什么,那就是外国人的事了,但也取决于我们研究的程度,特别是我们的学说中所包含的一般性因素。

有一种观点我是历来不同意的,即否认经济学的国度性,并把外国某一学派的学说直接说成是可以指导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学说,进而认为中国只能“运用”这个学说来发展经济。持这种观点的人,有的干脆否认“中国经济学”的提法,说经济学只有世界性一般,中国不该、也不能有特殊的经济学;有的虽然也提“中国经济学”,但把它视为外国某学说在中国应用中的具体环节,是对这一学说的演绎和模仿。

中国是特殊,外国也是特殊,一般存在于这众多特殊之中。人类可以,也应当有一般性的经济学,但它必须是在对各特殊的、国度性的经济学的总体概括中形成的,而非某一特殊学说直接就是这一般性经济学。

经济是利益关系的集合,不同的利益群体(阶级、阶层、团体)对经济的要求和认识也是不同的,这样,就使经济学又具有了它的阶级性和阶层性。外国经济学说之所以有众多派系,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而中国人接受外国学说的取舍标准,亦在于此。

虽然经济学界派系林立,但归总起来,不外两大流派,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前者是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体现,后者是劳动者利益的体现。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们曾是反对封建统治制度的斗士,但当他们所代表的资本所有者上升为统治阶级,其原有的斗争性也就为辩护性和实用性所代替;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劳动者争取自身利益和解放的运动，其批判性和斗争性是明显的。可是，当社会主义运动在一些国家制度化，这些国家又形成了一股因既得利益的保守势力，他们将马克思等前辈思想家的学说教条化，使之成为维护其既得利益的工具。而这股势力中的权贵者们，又不满足于保守既得利益，他们还要求更多的利益，于是，就在指责因他们的保守而造成的经济停滞的同时，提出以争取他们及其子孙后代更大的利益为核心的“改革”。苏联的叶利钦集团是最典型的例子，为了这种“改革”，他们不惜损害国民经济，以毁十取一或毁百取一的入室盗贼的心态，来建立他们认为更有“法制”保证的新制度。与此同时，他们放弃并攻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其“改革”的舆论工具。而他们所建立的制度，却不可能是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他们取得权力并以权力攫取资本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主义和制度只能是官僚资本主义。

中国人在接受外来的经济学说时，也有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集中表现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然而，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对这两种主义的理解也往往带有本国的“特色”，乃至从实用的角度来曲解和利用主义。这里最突出的，就是近年来在“社会主义”的旗号下，系统地宣讲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而一些宣讲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思想的人，又实际上为官僚资本服务，如关于“腐败有理”、“官倒有功”的论点，就是这样出台的。

虽然有这些曲解，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阶级性含义却是不可更改的。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者首先要确定的，也正是这一点：概括劳动者利益并由此认识经济社会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探讨中国和世界的经济矛盾，并吸收和借鉴外国的经济学说，特别是外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任务。

同样的，现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者也很明确其性质和使命，

即为资本所有者服务,将他们的利益说成“国家的”、“全民的”的利益,全面地照搬外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说,为中国资本所有者的形成——在目前主要的形式就是权力变资本——和发展出谋划策。

这样,当我们再说“中国病”时,已经有主观上的大分歧。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经济矛盾,是大不一样的,而他们治病的方法,也有根本的区别。

中国资本主义者的路数已经相当清楚:以各种方式,包括“官倒”、贪污贿赂,以及卖、租、赁 50 年来积累的公有资财,实现“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并为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扩张扫清道路,创造一切条件。这是很明确,也很系统的路线。

与之对比,中国社会主义者却相形见绌,一些固守苏联教科书观点的人,还以“苏联模式”来批判“私有化”,但对如何发展中国经济提不出足以与资本主义者抗衡的路线。观点和方法上的陈旧,使他们曲高和寡势单力薄,只能发牢骚,不能提出建设性见解。

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只有以辩证的方法进行理论的创新,形成对世界和中国经济矛盾的系统学说,才能在与资本主义抗衡的同时,从思想和逻辑上压倒它,并由此而解决中国的经济矛盾。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它不仅涉及对具体经济矛盾的探讨,而且包括对抽象层次经济矛盾的进一步规定。

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纲要》^①一书中,我对经济矛盾系统的层次做了这样的规定:一、人类各社会和各种存在形式中都普遍存在的基本矛盾;二、若干社会形态共有的矛盾,主要是商品经济的矛盾;三、各社会形态的一般性矛盾;四、各社会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矛盾;五、国度性经济矛盾;六、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矛盾;七、具体的经济矛盾,包括各行业、部门、企业及个人的经济行为;八、国际间的经济矛盾。

^①该书 2000 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探讨中国经济矛盾,从形式上说是在第五层次以下,20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学者,也主要是在这个范围发表议论,而把第一至第四层次矛盾的规定视为“先进”的外国人的专利,我们只能以其各种结论为前提,不能对之进行探讨和论证。更有甚者,在第五至第八层次上,也以相应的外国人的结论或“模型”为依据,只把中国的材料作为“案例”予以论说。

我们所要做的,则是对经济矛盾系统各层次的全面探讨。在第一至第四层次上,既要吸收、借鉴外国人已有的学说,又要对之改造、充实,乃至重新规定。进而,明确第五层次的国度性经济矛盾的存在和中国经济矛盾的主体性,由此,更为具体地探讨第六至第八层次的矛盾。

实际上,外国经济学家并没有对经济矛盾系统的层次做过明确规定,但当我们做出这种规定以后,却可以从他们的论著中找到与这些层次相对应的论述。其中,马克思的系统性最为明显,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曾从对这部著作设计的角度,分出了约五个层次。我的八层次划分,就是受他的启发而逐步形成的。而关于第一、二层次的规定,有的内容取自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但也有一定的改造,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规定人类基本经济矛盾,这是马克思的基本经济观点,我在以前也反复强调这一点。但到去年写作《主义 方法 主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基本》^①时,我则对此产生了怀疑,提出从“劳动者素质技能与其经济地位”这个更基本的关系规定基本经济矛盾,而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视为“劳动者素质技能与其经济地位”的社会表现。再就是关于第二层次的商品经济中的价值,也应在坚持劳动原则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和充实。

对第三层次,马克思主要规定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一般性矛盾,对此,既要坚持其基本点,又要根据百余年的新发展予以充实。更重要的,则是对社会主义这个新经济形态一般性矛盾的规定,特别是社会主义本质与其制度的规定。

^① 该书 2001 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